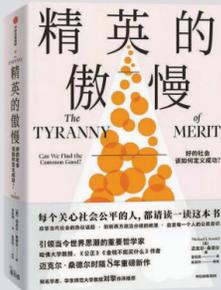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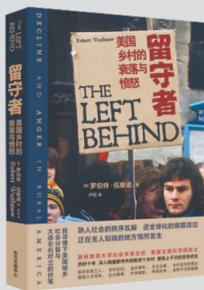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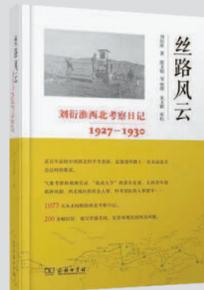
黄永玉的最新诗集。一生的诗歌全编，一生的爱、怜悯与感恩。《见笑集》黄永玉著 作家出版社 2021年11月出版



哈佛大学教授、《公正》作者重磅新作，反思美国梦的破碎，重新思考教育目的、工作意义。《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美] 迈克尔·桑德尔著 曾纪茂译 中信出版社 2021年11月出版



再现美国乡村社会熟人社会秩序的瓦解过程，思考日益加深的美国城乡分裂。《留守者：美国乡村的衰落与愤怒》[美] 罗伯特·伍斯诺著 卢屹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1年10月出版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先行者、气象学家刘行淮的日记，西北史和丝路史的重要史料。《丝路风云：刘行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刘行淮著 商务印书馆 2021年9月出版



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20年精心授课讲义，《庄子》进阶读本。《庄子讲义》陈引驰著 中华书局 2021年9月出版

书人茶话

六十年人生路，非常岁月里的中国

——读内山完造《花甲录》

孙小宁

2021年7月，当我获邀参加天津的内山书店开业典礼而动身前往时，下意识便带上了一本内山完造所著《花甲录》(九州出版社出版)，年初刘柠先生所赠，译者也是他本人。不想到了活动现场，主办方提供的资料袋里，竟然也有一本《花甲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出版社不同，推出的日期则前后脚。看着内山书店的历史照片墙，听着周令飞、郭沫若后代的往事回忆，两方并陈，这本书变得格外意味起来。

内山完造的著作，以前所见多是《活中国的姿态》，我也买过更名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新星版。但这本《花甲录》，据刘柠先生介绍，以前并没有完整译本。日本人特别爱说“真面目”一词，我感觉自己也是真正读完这本《花甲录》后，才多少了解了传主本人某种根底的禀性。

还不止于此。当内山完造这样为自己的回忆录定调(此处译文我随机选天津版的《花甲录》)：

“我的历史绝非他人历史之借物，也并非谎言。既不是欺人之物，更不敢妄自尊大。我的历史必须是我自己的。从这意义上讲，出于责任和义务，一字一句不肯草率行事。如今，我肩负着这份责任和义务来书写个人的历史，虽知逊于蚌蚶，不及砂粒，却又无反顾……”

其实就这预料到，书里所包含的人情世态与历史信息，有得嚼，有得回味。

长江口岸，那个推广眼药的店员小伙伴

《花甲录》从时间轴来论，大致可分为人中国前与人中国后。1913年28岁算第一个阶段；1913年到1945年(60岁)迎来日本战败为第二阶段。前个阶段都在日本，第二阶段则在中日间往返。创办内山书店的想法，始于1916年，真正开业，则在次年。与此同时，内山完造还投入了许多书店外的事务。这也可以肯定，《花甲录》还有很多在《鲁迅日记》记录之外。

内山完造出生于日本偏远的中国地区，念书只读到12岁。之后弃学到大阪当佣工，辗转于不同店主手下，经手推销各类生活用品，等于早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读这部分内容，我经常脑补的是日本那些老电影。非小津式的电影中，常能看到明治、大正时代那些在底层奔波讨生活的人。小生意的沉浮成败中练就的都是些既务实、又精明且人情练达的老派日本人。久处大阪，还会身染关西人的豪爽。内山完造入中国



▲2021年7月新开张的天津内山书店



▲鲁迅(左)和内山完造

《花甲录》[日] 内山完造著 刘柠译 九州出版社出版

时，身上应该有这类日本人的底色。若说还多一种精神底子，那便是由佛教渐次转向的基督教信仰。

内山完造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这个字眼，当是15岁读到的一本记有北清事变(即著名的八国联军侵华)的《东洋战争实记》。13年后，他作为参天堂的店员，到中国来推广日本品牌眼药，是因为意识到——“时代已经发展到要靠学校的成绩和文凭来决定所在位置”，而“世人平均五寸高，而自己只有四寸五分，自然抬不起头来，不如干脆进入四寸人的社会，即以中国为舞台，在那里生活，肯定会有活路。”(刘柠译)那时的日本正处于脱亚入欧的亢进状态，普通日本人会有这种高低偏见也是时代氛围使然。

但“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刘柠译)，如此浩瀚的景象，便是28岁的内山完造所看到的中国第一眼。江面，后来相当长时间成为内山完造所面对的中国——因要将眼药推广到中国各地，他们必须沿着长江上下游口岸，一个站点一个站点贴广告，这是原始的商品硬广，却让他扎扎实实地接了中国的地气。内山完造的这份南中国经历，说它是近代中国长江沿岸的生态备忘录也不为过。这生态还不止是沿岸风物景致，还有同他一样在此间打拼讨生活的中国平民的生存样态。我们说涉入商业，就深入到社会内部的毛细血管地带，考虑到他所在之地，正与其母国，面临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这时所感受到的外在敌对关系下的时松时紧，应

该更有历史参考价值。

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

有关内山完造的中国观的形成，刘柠在其译书前言中做过全面梳理，我只说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活中国的姿态》之姿态之“活”，实是和这段在中国的江河湖海里扑腾打滚的经历有关。当然，也跟他是从事商业事务有关。所以他一落笔写中国，就显出和那类从文献到文献的日本“文章家”的不同。当然，他的认知也是渐进的，一个细节对比是：初入中国，面对船板上普通船工千年不换的中国式早餐，他还得米饭上打个生鸡蛋，来满足日式的胃。但是到了写《活中国的姿态》的1935年，他已体会到以胃肠满足为基准的中餐的实用，转而在论母国那种以洁净养眼式审美为骄矜之非了。

过去夸某个外国人懂中国事务，谓之“中国通”。现在时尚说法是“知中”。但是“知”也要“通”也要，还得看立足点。在内山完造这里，最可贵的是一种想深切地理解别人的愿望：“有一件事让我遗憾不已，参天堂社长田口谦吉逝去，我曾和他约定，‘我不敢保证大学眼药的销售一定能取得，但是我一定多多地了解中国。’”

我们当然可以说，内山完造对于中国商人“看人下菜碟”式的定价法的类似观察，带着商人才有的精准思维。但更重要的还是，他遵循了“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这个外来者的谦卑立场。在差异对比中返观日本，他也时不时带出对于自身文化的反省。

社会事务，依然是内山书店之外的内山完造

内山书店对中国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自有书中的总结为证：“毫不夸张地说，左翼的书籍翻译，……三百三十种全出自我的书店。八百三十多种译的日文现代日本文学目录中的译者，大部分是内山书店的客人，留日的四十三人。”但是不难注意到，涉笔书店事务，内山完造并没有针对那一场合文艺漫谈会内容，说过感受想法；对与会者，也鲜有主观评价。这可能就是身为书店老板的“度”。他更多的观察与心理抒发，是在书店外事务。从早先的“夏季文化讲座”，再到日本文化人在中国高校的巡回讲座，还包括经营日语学会，参与关西大地震、汉口水灾中的赈灾等。这些都能看出，内山完造其实是个愿意在实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之人。因为介入了具体的运转，所以对其中的机制与问题看得门儿清。内山完造曾经说：中国的赈灾多来自于多方实际经验，仅凭是否智慧这一点妄加评论是不恰当的。这固然是“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的立场的坚持，但也是从实际观察中来。

住与游之间，因“住”而生愿力

每当读到一本放不下的书，我总是习惯再扫周边。在藤春夫的《南方纪行》，被我从天津内山书店活动中购得，部分也是为这种周边阅读做准备。加上书架上本已有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

郎等著的《对中国的乡愁》，让听花的《菊谱新调——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戏曲》，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等，这时候再拿出来看，文人和他的笔下分野，就看得分外鲜明。专业的著述且不论，日本文人所谓的对中国的乡愁，准确说仍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乡愁，建立在对昔日汉籍的阅读与想象当中。短暂的飞行打卡，转瞬而过的人之交集，都可能因某个现实中的不堪而将那乡愁打个折扣。唯内山完造，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地生活着，这是“住”和“游”的区别，也是因“住”而生情念继而再生愿力之别，其愿力就是：做中日友好的媒介。

作为非文艺界人士，他固然写不出佐藤春夫《鹭江月明》中，那对鹭江黄昏、月夜，歌妓以及中国音乐的丝丝描摹，也无法将此升华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人类意识的层面，但是，他对普通人心的把握、对中国时局趋势的判断，还是比他们深入且有分寸多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特殊时期能给予朋友有力援助者，即使是公认的鲁迅身边最亲密信任的日本友人，他也会认真撇清一些事实：“在先生去世后，中国有报纸、杂志报道，说我在经济上援助过先生。每次我都提醒：‘这是对先生的褒奖。对先生从未有过一毛钱的援助。这正正是鲁迅先生杰出的品质所在。虽然曾有先生将钱寄存我这里的，但是从未跟我借过钱。我即便是想到先生有难处，我也害怕伤害先生而未提过起过。’”

而在战争中间在日侨界参与创建“上海童谣协会”，他着意的仍是，不让孩子们对战争感兴趣。战败撤侨中，他对自己的同胞同样也施予有力援手。国与国关系风云变幻，但他的作为轨迹清晰可见，处处有他为自己确立的“人”的尺度。在此，看他那些具体事件中的作为，反倒比日本文人笔下的中国，更让人感念。

《花甲录》读之有味，还在于每个年头开始都附有中日历史年表。这是内山战后离开得匆忙，没有带回头资料时借以回忆往事的重要参考。现在看，更像是一个东亚维度的历史进程表。受此年表启发，我也依着《花甲录》叙述，自制了一个内山完造年表。最后时间不得不停于1945年，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他在后来岁月中活动的身影。不用费神多想，这些依然和他念兹在兹的中国有关。或许内山书店能重回中国，也是他的愿力所致。心中的牵念，在今年，终于落到一个具体事上，这大概比对他的书的阅读，更符合他本人的心性吧。

(作者系媒体人、作家)

三味书屋

生生不息与万物有灵

来颖燕

读罢《树孩》，合上书，眼前隐约闪现出一个黄杨木雕的“树孩”。这部被划归为“儿童文学”的童话，又一次告诉我们，童话的大门不只是向孩子们敞开。

故事讲述了一棵黄杨树的前世今生——曾经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枝繁叶茂，因为遭遇了骇人的森林大火而几被毁灭。上山寻找创作材料的雕刻家和儿子春芽发现了这棵被烧焦的黄杨树，并将其一段段捡回家，雕成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树孩诞生了，黄杨树的生命被树孩延续。树孩几经流转颠簸，它的眼睛从此见到这世间的种种善恶和苦乐……

《树孩》的开始，那棵开口说话的黄杨树慢慢地将我们拽入这个充满灵性的世界。生灵开口，常谓之拟人。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作者的立场并非局限在“人”的角度。黄杨树和它的伙伴们充满了对于这个世界的懵懂和感知，包括对于人类的恐惧、对于生命无常的敬畏。作者似在有意复原自己的感官，以陌生化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个世界——那是树孩的眼光，纯净、未受污染。随着树孩的历险，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眼睛开始和树孩的重合，自己的一部分嵌入了树孩的身体里。

这个过程中，一个有趣的悖论在悄悄但是切实地发生——树孩能抵达人类所目不能及的地方，它可以和万物对话，却无法让人听到它的语言，无法跟人交流。正是这种“无言”所制造的冲突和效果，让作品更为真切感人。

在童话中，这种“尽言”和“无言”的相悖之境是常见的。《树孩》会让我想起安徒生的《坚定的锡兵》。那个受尽磨难的小锡兵，可以反抗玩具魔法师，可以跟跳舞的纸娃娃说话，却无法告诉他的主人男孩彼得自己的遭遇。但童话通常担负着教化的功能，比如这个锡兵的故事会让我们想起，只要勇敢地坚持理想，总会得偿所愿。

只是《树孩》的故事里所蕴藉的道理，忽明忽暗，更确切地说，不曾有明确的道德上的训诫指向——尽管一路走来，树孩的遭遇映射出许多哲理，但它并不曾因为自己的善良或是纯真而达成了什么目标和愿望。它的历险最后并没有在我们的期待中获得什么高潮，它只是自然而然地，“随意”地获得了一种重生——重新生根，重新发芽。但这一切，都如老槐树告诉我们的：是碰巧。

作者的诗人思维此刻显形——不是线性的、预设的，而是整体的、发散的、浑然的，滚雪球一样牵扯众多。如果说树孩的命运和经历有一个线头，那便是作品尾声，芦苇们的深沉合唱：“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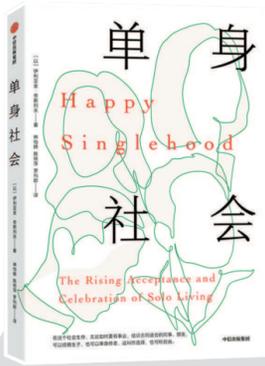
作者曾说，这部作品写到最后，会觉得舍不得停笔，舍不得写完。这或是因为“生生不息”的故事会一直在路上，在行进中，无法被结局。万物有灵，这个古老的信念，不只是出于我们生而为人能感知万物的自信，更是源自一种对于自然的体贴、尊重和敬畏——这部作品的主角，实则并不只是树孩，而是天地万物。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上海文学》编辑)



《树孩》赵宏涛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域外之眼



《单身社会》[以] 伊利亚·奇斯列夫著 林怡婷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在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下，随着婚姻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的衰退，越来越多人选择单身。如今，北欧国家独居人口接近总人口50%以上，在美国超过40%，即便许多被公认是信奉保守宗教价值观念的国家，比如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等的独居人口也在直线上升。这样的现象引起了众多社会学家的兴趣。日本的伊坂幸太郎和美国艾里克·克里南伯格都曾经基于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写过单身

单身社会的兴起与未来

顾舜舟

社会领域的著作，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伊利亚·奇斯列夫的这本《单身社会》进一步推进了相关研究。克里南伯格等人的研究主要是描述美国的单身选择单身。与一般的认知不同，他的调查发现美国单身群体生活远比想象的幸福快乐。绝大多数单身者远比同龄已婚人士更加热衷于各种社交活动。不仅是30岁左右没有结婚的，大多数后来选择离异的人也在享受个人生活的乐趣而非陷入孤独和痛苦。相比之下，奇斯列夫不仅观察单身男女在做着什么，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更提出了相应的社会政策，使得单身群体少受传统社会偏见乃至歧视，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

虽然奇斯列夫是科班社会学训练出身，但是他把研究出发点锚定在个体幸福感而非社会学聚焦的社会功能上。所谓的幸福感被界定为一种主观感受，通俗来说就是“感到幸运，顺心如意”。它类似于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效用”，决定了人的行为和选择。既然幸福是主观概念，那么各地各族群自然存在巨大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也导致了幸福感内涵因地而异。如何处理这些天差地别的幸福感并纳入同一框

架内展开讨论呢？面对这些困难，奇斯列夫采用了大数据方法，纳入大型样本，横跨各年龄和地区，从而平均特异值，达到基本反映真实幸福感水平的目的。

主流观点认为婚姻制度增进幸福感、克服孤独和社会疏离并提供更为坚实的安全保障。但是，大型调查表明，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结婚两年后，幸福感就滑到基准点，而离婚之人幸福感降到基准点以下，甚至比原来更加不快乐。而单身人口在某些阶段幸福感或有起伏，但是总体上在社交、工作成就和自由程度上都比已婚人士有过之而不及。由此来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其实是幸福感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奇斯列夫洋洋洒洒列出了八个原因，包括人口增长模型从马尔萨斯陷阱变成沃尔夫冈的长期下降趋势、女性越来越独立、离婚率飙升、都市化、网络社群等等。具体来说，婚姻家庭既不减少孤独，其长远社会功能也随着制度和技术的变化而日渐削弱。许多人认为找个人结婚成家，似乎是“排除孤独的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实际生活中，“孤独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解决方法

有来自于自我认知的扭转，而不在于是否结婚”。许多夫妻结婚后实际上同床异梦，除了抚养子女，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沟通。女性固然受到传统婚姻束缚，为照顾子女而牺牲了自身利益和潜力，其实男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奇斯列夫发现，男性结婚后，家庭生活压力增加，他们对亲朋好友不像以前那么大，以往的社交圈通常会有所缩小，参与的频率也大幅度下降。因此，许多男性在结婚后反而装进了套子，在遇到困难时，更为弱势和缺少情感上支持。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养老和医疗照顾等都逐渐由各级公营机构或盈利性私有机构取代了家庭承担此项职能。此外，信息技术革命塑造了大批的网络社群，单身人群可以从家庭之外的群体中获得情感和其他资源的支持。

尽管单身人士在个人生活上远非常人偏见的那样孤独不幸，但是奇斯列夫指出单身人士遭受到普遍的污名化和歧视。日常工作中，在安排加班和出差时，单身人士总比已婚人士更为优先承担苦活累活。在房屋租赁市场上，单身人士常常被贴上性格孤僻等标签而不受房东们青睐。即便在公共领域中，

政策层面也鲜有顾及单身人士的。因此，奇斯列夫在书的结尾的第三部分分析了单身群体对于社会经济的正面意义，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来适应正在到来的单身大潮。他认为单身群体比起已婚群体更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单身群体中普遍把工作视为其成就感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消费支出也大幅度超过平均水平。有鉴于此，他建议在宏观政策上要针对单身群体做出安排，比如在城市规划方面，要设计适合单身人士的公寓和娱乐场所；在社会服务方面，要培训更多专业社会工作人员来照顾年老的单身男女，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公平。

总的来说，《单身社会》是研究西方社会中单身问题方面又一部佳作。但奇斯列夫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欧美国家的社会现实，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等国家的不完全符合。比如，在他的研究中就缺少重视被迫单身和自愿单身的区别，更谈不上对其成因和生活经历详细分析，而这些问题期待待中国等国家的社会学者作进一步研究。

(作者系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学者)